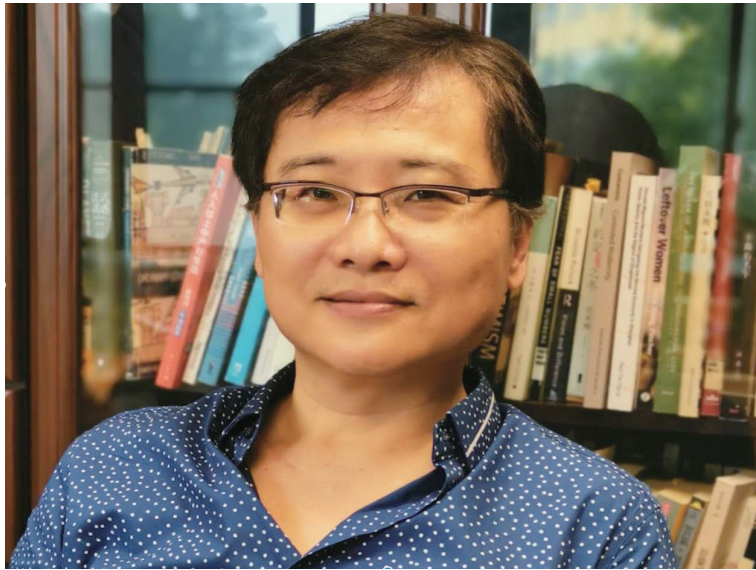


學術後進者的反身與脫身

徐進鈺*



承蒙《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的邀請，讓我跟大家分享自身的學習經驗，因此不揣愚昧寫就此文。

我大學時期就讀臺大土木系，畢業之後考進臺大建築與城鄉所碩士班，這兩年真正開啟了自己的學習與研究的世界。城鄉所訓練的長處不在於理論思考或思辨，而在於對於經驗世界的觀察與批判，透過實習與現場訪談、與地方行動者（包括地方政府、廠商、非正式部門業者、以及鄰里組織）互動。1987年參與彰化綜合規劃的經驗，讓我在一定意義上重新認識臺灣，特別是社頭的織襪、和美的雨傘及鹿港的小五金，這種高度群聚代工生產的非正式部門廠商，實際上構成了臺灣奇蹟的重要柱石，前後兩年的時間在彰化平原上，逐步解開臺灣作為世界生產體系的代工之謎。在 1980 年代末，臺灣面臨社經轉型，有幸

*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科技部人文司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召集人

透過城鄉所草根式的學習，理解真實經驗的豐富多樣。這個經驗對我日後的學術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深信具體經驗研究的重要性，而非僅是在政策或文獻上打轉。

此際國際人文社會研究的發展，特別是我比較熟悉的政治經濟學，也正聚焦東亞現象，從 1980 年代的「日本第一」研究到 1990 年代開始注意新興工業化國家 (NICs)，特別是韓國及臺灣等後進國家的經驗，到了 2000 年之後，這個轉向無疑地被崛起的中國研究完全支配。我個人的學術生涯則是在 1990 年代研究所畢業後，開始思考赴國外求學的可能性，最後選擇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地理系攻讀博士。在 1990 年代，臺灣研究得到了一定的關注，尤其是有關民主化及產業轉型（半導體及個人電腦產業所代表的升級）的相關議題。這對當時申請出國及研究方向上的選擇，都有相當的影響。當個人研究興趣非常幸運的可與更廣大的社會乃至世界的發展接軌時，研究成果便相對獲得不少關注與對話的機會。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便是臺灣半導體發展中的國家與產業的互動關係，特別是有關臺灣新竹與美國矽谷之間的跨國產業網絡與技術社群的發展，最後寫成學術論文並發表。直到今日，我與指導教授 AnnaLee Saxenian 在 2001 年合著的文章，已經有超過 800 次的引用。如此的成就在相當意義上，是受益於臺灣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受到國際學界注意的歷史時勢，我只是很幸運地搭上了這班列車。

我的研究主要是地理化的政治經濟學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GPE) 取向，關注政治經濟的過程中社會—空間的差異及多樣化，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地理架構 (geographical framing) 的建構、發展與矛盾。我在 2006 年之前從事有關臺灣新竹—美國矽谷的技術社群網絡研究，以及之後隨著高科技臺商擴張到中國大陸，特別是珠三角及長三角的廠商與社群網絡的研究。獲得當時國科會吳大猷獎 (2002) 及傑出獎 (2006) 之後，我開始將研究聚焦於 1980 年代後期開始的臺灣新自由主義論述與干涉主義的國家政策之間互動，所引發的不同地理尺度空間組織變遷。這些研究強調許多重要的議題，諸如國家自由化的路徑如何形成新的國家空間 (state space)，以及區域的不均衡發展，這樣不均衡的空間發展又如何形塑新自由主義政權下的去管制與再管制過程？這部分的成果也發表於城市與區域研究中 Q1 的著名國際期刊。

2013 年開始，身為資深學者，我開始針對地理學基本的概念 (包括空間、地方、區域、領域、特區與邊界) 進行再概念化的工作。在此一企圖下探討在東亞國家中盛行的特區計畫 (zoning project)。具體經驗研究對象包括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乃至 2000 年之後新型的自由經濟區 (或自由貿易區)，檢視這些

國家在不同階段因應發展的機會與威脅時，所進行的例外空間的策略。如此的策略與國家轉化、地緣經濟的崛起、地緣政治的算計、後殖民現代性、以及空間組織（包括邊界、領域與跨界）的重構等息息相關。這部分的研究成果出版在人文地理學的頂級期刊，包括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及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因此獲得 2018 年國際地理學的 Ashby Prize，以及本年度科技部的傑出獎。

回顧自己的學習歷程，作為一個人文地理學者，從 30 年前開始接觸臺灣彰化的鄉村工業化現象得到啟蒙，瞭解具體社會經濟生活的樣態，啟發我研究的疑惑及發問，同時結合國際學術的時勢，發展出臺灣產業的群聚與升級的研究，作為學術生涯的起點。在此過程中，不斷地與主流學術的理論概念對話（或者準確的說，主要是應用），並試圖凸顯臺灣經驗研究的特殊性，這亦是地理差異的重要性（*geography matters*）。如此的視角，在隨後的有關臺灣新自由主義與國家轉化的研究上繼續深化，並更熟悉國際學術社群的網絡，逐步建立國際學術聲譽，因此，我目前擔任七個人文地理主要的國際期刊的編輯委員，並與日本、韓國及香港學者成立了東亞批判地理學組織，歷經 20 年的運作，成為國際上研究東亞的地理學者的重要會議。

這樣的成果給自己一個反身自省的空間，那就是作為東亞後進（不只是技術與產業，更重要的，是學術的後進者），似乎與國際主流學者成為一種分工：西方學者提供理論概念，我們提供經驗研究（頂多就是我們有些不同，所謂地理的差異性），這樣的學術代工可能是自己參與國際學術社群的捷徑，但當自己成為資深學者時，對於如此的學術分工其實有更多的保留、批評與不甘，對自身的期待亦隨之改變，期許自己可以跟主流學術理論者在更多概念性的工作上進行對話與批判，而非僅止於經驗研究的個案提供者。長期來看，這是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但特別是擅長於個案研究的人文地理學者，必須面對的學術障礙與超越的可能。但我也相信，只有真誠地面對我們知識與學術發展上的困境，才有勇氣與能力從此困境中逃逸解脫，更上一層樓。